

“经教”、“波斯经教”是“景教”的别名吗

聂志军

提要: 长期以来,学术界根据唐代的两则诏令,一直认为“经教”是景教的别名。本文从语言学角度出发,发现唐太宗贞观十二年七月诏令“远将经教”中“经教”与《景教碑》“远将经像”中“经像”构成异文的语言现象,结合唐代“经教”、“经像”的使用情况,确定其意义应该是一个中性名词,即“对某一宗教经典典籍的称呼”,儒道释教均可称呼本教经典典籍为“经教”。因此,景教称呼本教经典典籍为“经教”也在情理之中,从根本上否定了“经教”是景教别名的可能,纠正了前人对于景教名称的误读。

聂志军,文学博士,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讲师,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。

主题词: 景教 经教 波斯经教 经像 别名

景教(Nestorianism)是指罗马教会视为异端的“聂斯脱利派(Nestorianism)”,该教派创始于公元498年前后的波斯帝国境内,教名源于创始人——叙利亚人聂斯托利(Nestorius)。聂氏因竭力倡导基督“二位二性”说和“玛利亚人母而非神母”说,从而使自身及教派背上了“异端”的臭名,付出了破门的代价。为了生存和发展,被迫一路东渐,最终于公元635年传入中国。景教得名来源于建中二年(781)景教徒建立的《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》^①,碑文有相关内容:“真常之道,妙而难名。功用昭彰,强称景教。”此碑于明代天启三年至五年(1623-1625)在西安出土之后,这一宗教即被称为景教。

对于景教得名的原因,前人已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,相关内容可以参考李之藻《读景教碑书后》、钱念劬《归潜记》(丁编之一)、潘绅《景教碑文注释》、朱谦之《中国景教》。本文感兴趣的是另一个问题,那就是长期以来学界在介绍景教的时候,伴随景教一起出现的另外两个称谓“经教”、“波斯经教”是否是景教的别名?

“景教”这个名词,目前可以确认的,最早见于上文提到的建中二年(781)建立的《景教碑》。《景教碑》属于地下出土材料,但是在《景教碑》出土之前,在中国的传世史籍上,找不到

“景教”这个词。至于是否有更早的用例,还有待于更多材料的发现。唐代景教文献和“景教”有直接联系的就是“经教”,或者具体一点,称为“波斯经教”。

首先,值得特别指出的是,唐代景教文献中很少涉及到教名的称呼,“经教”一词只在《序听迷诗所经》中出现过一次,并且一直没有引起注意。如下:

(1) 其人见如此,亦为不信經教死活,并为弥师诃[弟子]。(《序听迷诗所经》, L169-170^②)

《序听迷诗所经》属于敦煌写经,原文作“經教”。“經”为“经”的俗字,张小艳《敦煌书仪语言研究》俗字表中收录有“經(經,经)”^③。因此,“經教”即“经教”。唐代景教文献中仅此处出现一次,前人对此均忽视不释。目前唯一的对唐代景教文献进行注释的翁绍军的《汉语景教文典诠释》在注释上述例句的时候,只注释了“并为”一词,对“經教”略而不谈^④。

其次,教外人士称呼景教为“经教”、“波斯经教”倒是由来已久,其可靠的直接来源就是唐代的两条诏令。如下:

(2) 贞观十二年七月,诏曰:“道无常名,圣无常体。随方设教,密济群生。波斯僧阿罗本,远将经教,来献上京。详其教

旨，元妙无为。生成立要，济物利人，宜行天下。所司即于义宁坊建寺一所，度僧廿一人。”（《唐会要》卷四十九）

(3) 天宝四载九月，诏曰：“波斯经教，出自大秦。传习而来，久行中国。爰初建寺，因以为名。将欲示人，必修其本。其两京波斯寺，宜改为大秦寺。天下诸府郡置者，亦准此。”（《唐会要》卷四十九）

例(2)为唐太宗贞观十二年(638)七月诏令，例(3)为唐玄宗天宝四年(745)九月诏令。后人认为“经教”和“波斯经教”是景教的别名，大概都是来源于此。例如，江本汉就是这样理解上述两条诏令的：“太宗贞观十二年(638)七月的诏令称之为‘经教’。玄宗天宝四年(745)九月的诏令则称之为‘波斯经教’。”^⑤关英也是如此认为：“据《唐会要》卷49载，唐玄宗天宝四年(745)的一段圣旨中，称该教为‘波斯经教’。”^⑥更有甚者，叶蓉进一步猜测“景教”与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，提出：“会不会还有这样一种可能呢：‘波斯经教’去掉‘波斯’后，变成‘经教’，而‘经’与‘景’在语音上相通，导致‘景教’名称的出现。”^⑦

除此之外，还有撇开两条诏令，直接认为“经教”、“波斯经教”为“景教”别名的。例如，朱谦之明确指出：“景教又称波斯教或波斯经教，教外人亦称之为弥施诃教或弥诗诃教（宋道家贾善翔撰《犹龙录》六卷所述九十六外道中，第五十种为弥施诃外道），盖即《旧约》中之 Meshiha 或 Messiah 之译音。”^⑧李伯毅谈到：“从太宗建寺到玄宗改名，约经过一百零七年，仍称‘景教’为‘波斯经教’。”^⑨石明培也谈到：“早年因景教经波斯传入中国，故曾称‘波斯教’或‘波斯经教’。”^⑩

从前人的叙述来看，“经教”、“波斯经教”是“景教”别名似乎是有据可查，毋庸置疑的。但是促使笔者产生质疑的是《景教碑》在转述太宗贞观十二年诏书的时候，将“经教”改为“经像”。如下：

(4) 贞观十有二年秋七月，诏曰：“道无常名，圣无常体。随方设教，密济群生。大秦国大德阿罗本，远将经像，来献上京。详其教旨，玄妙无为。观其元宗，生成立要。词无繁说，理有忘筌。济物利人，宜行天下。”（《景教碑》，L10-11）

例(4)与上文例(2)两相对照，可知二者相似度极高。首先，时间完全一样，一是“贞观

十二年七月”，一是“贞观十有二年秋七月”；其次，内容也大致一样，《唐会要》记载稍微简略，《景教碑》记载更加翔实。究其原因，《景教碑》是竖碑纪念景教在华传播的丰功伟绩，辞不厌烦，自然可以理解。此外，“经像”中“经”的写法与例(1)中敦煌写本《序听迷诗所经》“经教”中“经”的写法一样，都是“经”的异体字。由此可以说明唐太宗贞观十二年诏书与《景教碑》的可靠性毋庸置疑。

除此之外，我们还可以找到“经教”与“经像”互换的例证，如下：

(5) a. 长生殿内道场，自古以来，安置佛像经教。……今上便令焚烧经教，毁拆佛像，起出僧众，各归本寺。（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》卷第四）

b. 尔时魏齐东川佛法崇盛，见成寺庙出四十千，并赐王公充为第宅。五众释门减三百万，皆复军民，还归编户。融刮佛像，焚烧经教，三宝福财，簿录入官，登即赏赐，分散荡尽。（唐释道宣撰《广弘明集》卷第十）

c. 又周武帝狂悖无道，毁灭佛法，焚烧经像，破坏塔寺，罢废众僧，遂身生癩疮恶疾而死。（唐释道宣撰《广弘明集》卷第十二）

d. 凶众遂盛，所在屠灭寺舍，斩戮僧尼，焚烧经像，云新佛出世，除去旧魔。（《魏书·卷十九上》）

e. 王言：“大师，何者根本罪？”答言：“大王，有五种罪，名为根本。何等为五？一者破坏塔寺，焚烧经像。……”（《大萨遮尼乾子所说·卷四》）

(6) a. 太守李巖敬信佛法，问有沙门持经像乘船泛海而至，即将人从至海边，迎接经像，归至郡治。（《佛国记》）

b. 我在舍卫时，约救瞿曷身。汝共摩诃萨，贵经教东秦，历落神州界，迫至东海间，广宣至尊法，教授聋俗人。（《老子化胡经玄歌卷第十》）

例(5) a、b 中为“焚烧经教”，c、d、e 中为“焚烧经像”。例(6) a 中为“持经像”，b 中为“贵经教”。从这些例句可以看出，“经像”与“经教”都出现在动宾结构中，充当宾语。特别是“远将经教”与“远将经像”，分别出自一个相似度极高、只是版本不同的诏令之中，字数一样（均为四字），结构相似（都是动宾短语），唯

一的不同就是一是“经教”，一是“经像”。这使我们有充足的理由怀疑：“经教”与“经像”性质相同，是一种可以携带（“将”）、持有（“持”、“贵”）、焚烧的东西。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“经教”是“景教”别名的可能。相应的，“波斯经教”作为景教的别名也就值得怀疑了。

二

唐太宗贞观十二年诏令中的“经教”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是我们要进一步搞清楚的内容。《汉语大词典》没有收录这一个条目，根据上文的分析，“经教”和“经像”性质相同，那我们就从“经像”的释义入手。《汉语大词典》收录有“经像”：佛像。南朝齐王琰《冥祥记》：“汉明帝梦见神人，形垂二丈，身黄金色，项佩日光，以问群臣，或对曰：‘西方有神，其号曰佛，形如陛下所梦，得无是乎？’于是发使天竺，写致经像，表之中夏。”南朝梁王中《头陀寺碑文》：“宋大明五年，始立方丈茅茨，以庇经像。”北魏杨衒之《洛阳伽蓝记·崇真寺》：“虽造作经像，正欲得人财物。”从释义来看，“经像”意为“佛像”，显然不符合《景教碑》“远将经像”中的语言环境。但是景教在传入中国以后，为顺应中国传统文化和习俗，袭用了许多儒道释经典的语汇和思想来阐述教义。来华的景教士借助于当时极为兴盛的佛教的术语：妙有、慈航、世尊、僧、大德、法王、慈恩、功德、大施主、救度无边、普救度等。景教典籍也多模仿佛经形式，用语也多与佛经相仿；并以“佛”代称“天主”、将希伯来 Eldhjm 译作梵文之阿罗诃 A-rhat；且景教人物的汉译多称为“僧”，如僧景净、僧业利、僧行通、僧灵宝；约翰译为瑜罕难法王、路加译为卢伽法王、马可译为摩矩辞法王、摩西译为牟世法王。有鉴于此，几乎可以肯定《景教碑》是借用了佛教中的“经像”一词。翁绍军在注释上文《景教碑》中“经像”时，释为“圣经和圣像”¹²，可能是参考了“经像”有“佛像”的意义，再结合景教自身的特点，加上“圣经”。换句话说，是把“经像”拆开来解释，“经”指“圣经”，“像”指“圣像”。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代表作《全球通史：1500年以前的世界》在有关唐朝的一节中，也引用了《景教碑》中皇帝接见传教士阿罗本的一段文字，其中“经像”作“images and books”，上海社科本的译文是“偶像与经籍”¹³。同样也是把“经像”拆开，“经”指“经籍”，“像”指“偶像”。这样解

释，看似无懈可击，但是必须要面对一个问题，那就是按照这样的解释，《景教碑》中“经像”和佛教中“经像”意义并不完全契合，多出了一个义素“圣经（或者经籍）”。这促使我们思考，多出的这一义素是景教引入“经像”这个词后新增加的，还是佛教中原本就有、只是不为我们所熟悉呢？

行文至此，似乎已进入困境，我们只好又返回原点，佛教中“经像”除了意为“佛像”之外，是否还有其它义项没被《汉语大词典》收录呢？下面的例证证实我们的猜测不无道理：

(7) 弟子田伏宝，为先亡父兄、见存母弟，往为门亏十善，不树福缘，侄岩殒命于同罗，女子天辞于白日，虔心告佛，罄志归依。敬就三门石柱，刊《阿弥陀佛蜜多心经》，以乾元凶年四月五日镌镂功毕。桑海有改变迁移，经像固存乎不朽。（《常山贞石志》五，引自《唐文拾遗·卷二十二》）

(8) 贞观十九年，归至京师。太宗见之，大悦，与之谈论。于是诏将梵本六百五十七部于弘福寺翻译，仍敕右仆射房玄龄、太子左庶子许敬宗，广召硕学沙门五十余人，相助整比。高宗在宫，为文德太后追福，造慈恩寺及翻经院，内出大幡，敕《九部乐》及京城诸寺幡盖众伎，送玄奘及所翻经像、诸高僧等入住慈恩寺。（《旧唐书·列传第一百四十一·方伎》）

(9) 一人曰：“我本京兆府史，久在地府，求生人间不得。君可为写《金光明经》、《法华》、《维摩》、《涅槃》等经，兼为设斋度，我即得生人间。”……辞讫，行数里，至舍。见家人哭泣，因尔觉痛，遍身恍惚，迷闷久之，开视遂活。造经像及烧钱毕，十数日，平复如常。（《广异记·裴龄》）

例（7）中的“经像”即指所刊的“《阿弥陀佛蜜多心经》”，例（8）中前有“将梵本六百五十七部于弘福寺翻译”，因此后文所翻“经像”也只能是“翻经院”所翻“佛经”。例（9）中原京兆府史为了托生人间，求裴龄“写《金光明经》、《法华》、《维摩》、《涅槃》等经，兼为设斋度”两件事。裴龄醒后履行诺言，“造经像及烧钱毕”。两件事情对应，“经像”也是指提到的“佛经”。因此上述例句中“经像”均指“佛经”，不是指“佛像”。

此外，“经像”不但可以指“佛像”、“佛经”，还可以同时指代“佛像和佛经。”例如：

(10) 二年三月中, 奉为诸神, 写经图佛, 裂裳裹足, 弃命殉道, 繯负经像, 至于山麓。读经礼佛一七日夜, 坚发愿曰: “若使神明有知, 愿察我心。我所图写经及像等, 当至山顶, 为神供养, 以崇神威, 饶群生福。……” (唐空海《沙门胜道历山水莹元珠碑(并序)》, 引自《唐文拾遗·卷七十二》)

(11) 五帝之时, 父不丧子, 兄不哭弟, 致仁寿, 无凶短也。下逮三王, 国祚延久, 其臣则彭祖、老聃皆得长龄, 此时无佛, 岂抄经铸像力邪? 缘死丧造经像, 以为追福。夫死者生之常, 古所不免, 彼经与像何所施为? (《新唐书·卷一百二十四》)

例(10)中“写经图佛”、“所图写经及像”, 例(11)中“抄经铸像”、“经与像”, 清晰地告诉我们“经像”确实可以指“佛经”和“佛像”。其实, 这一语言现象前人早已注意, 晚清杨守敬《水经注疏·卷十六》: “西方有神, 名曰佛, 形如陛下所梦, 得无是乎? 于是发使天竺, 写致经像。”守敬按: “自汉明帝至此, 本《后汉纪》, 惟但言图其形像, 有经数千万, 而不云写经。”¹⁴从杨守敬的按语来看, 他也认为从汉明帝开始, “经像”只指“佛像”, 而忽视数千万写经的现象实在奇怪。

至此, “经像”一词包括“佛像”、“佛经”、“佛像和佛经”三个义项应该说已经很清楚了。只是一直以来, 我们熟悉的只是“佛像”这一个义项, 而忽略了另外两个义项。现在的问题是, 《景教碑》中“远将经像”中“经像”到底作何解释? 目前可以确定的一点就是仿照佛教中的“经像”而来, 但是具体所指却也颇费一番周折。景教也和佛教一样, 有所谓的“圣经”和“圣像”。那么, 景教中的“经像”是否也和佛教中的“经像”一样具有三个义项呢? 和佛教不一样的是, 景教传入中国, 没有汉明帝梦见神人, 因而“写致经像, 表之中夏”那样的故事。故不可能只指代“圣像”, 这一个义项可以首先排除。剩下的是“经像”到底是指“圣经”还是指“圣经和圣像”。第一种意见认为是指“圣经和圣像”。例如, 翁绍军在注释上文《景教碑》中“经像”时, 释为“圣经和圣像”¹⁵, 可惜没有进一步进行论证。刘振宁也是这样理解的: “景教传入中土的标识, 是贞观九祀景教上德(或大德)阿罗本携经带像至长安, 这一史事在汉语景教经文里被称作‘景风东扇’¹⁶。另一种意见认

为是指“(景教)经籍”。杨志玖写道: “唐太宗贞观九年(635年), 大秦国(古指罗马帝国, 唐代指东罗马帝国及叙利亚)主教阿罗本携带一些经卷到达长安, 受到唐太宗的礼遇, 令其翻译经卷, 有时还咨询他宗教问题。”¹⁷张雯霞指出: “唐太宗(627-649年在位)贞观九年(635年), 涅斯托里派教士叙利亚人阿罗本(Open, 七世纪)等携经籍自波斯来到中国长安传教。”¹⁸我们认为, 《景教碑》“远将经像”中的“经像”只能理解为“经籍(景教典籍)”。第一个原因是: 阿罗本“远将经像, 来献上京”的故事与佛教中僧人“持经像”、“斋(齋)经像”的故事很类似。例如:

(12) 后至中天竺, 于摩竭提巴连弗邑阿育王塔南天王寺得《摩诃僧祇律》, 又得《萨婆多律抄》、《杂阿毗昙心》、《缁经》、《方等泥洹》等经。显留三年, 学梵书梵语, 躬自书写。于是持经像, 寄附商客到师子国。(《出三藏记集·卷十五》)

(13) 显持经像随还。(《出三藏记集·卷十五》)

(14) 元奘, 本名诘, 俗姓陈氏, 洛阳缑氏人。出家东都净土寺, 后住长安庄严寺。贞观三年往西域, 十九年斋(齋)经像还京师。敕住大慈恩寺。¹⁹ (引自《全唐文·卷九百六》)

例(12)、例(13)是讲述东晋僧人法显到天竺取经求法的故事, 例(14)是讲述唐代僧人“玄奘”到西域取经的故事, 二人都是“持经像”、“斋(齋)经像”而返。其中《出三藏记集·卷十五》更是详细列举了“《摩诃僧祇律》、《萨婆多律抄》、《杂阿毗昙心》、《缁经》、《方等泥洹》”等经。景教阿罗本到中国来传教的经历与此相似, 景教徒很有可能就是仿照佛教僧人“持经像”而还的故事来记载阿罗本“远将经像”来华传教的故事。“持”有“携带”之义。《史记·滑稽列传》: “其人家有好女者, 恐大巫祝为河伯娶之, 以故多持女远逃亡。”唐韩愈《赴江陵途中寄赠三学士》诗: “持男易斗粟, 掉臂莫肯酬。”“斋”为“齋”的误字, “齋”为“齎”的古字, 也有“携带”的意思。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: “乃令入海者齋捕巨鱼具。”南朝宋刘义庆《世说新语·谗险》: “后丁艰, 服除还都, 惟齋《战国策》而已。”“将”也有“携带”之义。《三国志·魏志·裴潜传》: “谥曰: ‘贞侯’。”裴松之注引三国魏鱼豢《魏略》: “每之官, 不将妻

子。”宋陆游《夜与儿子出门闲步》诗：“家住黄花入麦村，闲将稚子出柴门。”因此，“持经像”、“斋（齋）经像”和“将经像”可以说是意义相近。

另一个原因与景教的教义有关。景教教义其中有一条，就是不用偶像。这也是景教被视为异端的一个重要原因。早期基督教为加强一神观念，反对偶像崇拜，《圣经》十诫规定“不可制造和敬拜偶像”，据西方学者 Wall 考证，景教徒绝不许可崇拜画像，也不许可崇拜十字架²⁰。既然佛教中所持的“经像”已经肯定是“佛经”了，景教的教义又反对偶像崇拜，那么《景教碑》中所“将”的“经像”不可能包括“圣像”，只能是“景教经籍”。当然，也许有人说，佛教中“佛像”一般形体巨大，不方便个人携带，而景教中的“圣像”却是方便携带的。因此，即使景教是仿照佛教的说法“持经像”而出现“将经像”的表述，也不排除有变通的可能，在景教中国化的过程中加上“圣像”。我们认为，这种可能也不存在。虽然《景教碑》中也记载了在景寺中悬挂“五圣写真”的事实。但是这应该是属于景教入华之后为了便于传播，采取上层路线的变通之举。在阿罗本入华之时就携带“圣像”是与传入中国之前的景教教义相冲突的，是断然没有道理的。葛承雍指出：“景教经由中亚传入中国后采取何种模式崇拜圣像，因史料模糊又无实物，无法考证。至今遗憾的是，没有发现唐代存有基督圣像，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唐代景教可能还是延续着无偶像、重音乐的宗教礼仪传统。长安大秦寺悬挂唐朝五位皇帝的画像来迎合君臣百姓，所以推测洛阳大秦寺也没有基督圣像，直到元代蒙古人才接受了基督受难形象，并佩带十字架铜铁徽章。”²¹

三

“经像”在《景教碑》中指“景教典籍”确定以后，和它对应的唐太宗贞观十二年七月诏令中的“经教”又是什么意思，就成为我们要解决的下一个问题。“经教”虽然不见于词典，但是在文献中常见。如下：

(15) 经教所开，凡有三科：一者禅思入微，二者讽味遗典，三者兴建福业，三科诚异，皆以律行为本。（晋·慧远《与桓玄论料简沙门书》，引自《全晋文·卷一百六十一》）

(16) 伽蓝十余所，僧徒二千余人，习

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。经教律仪，既遵印度，诸习学者，即其文而玩之。（《大唐西域记·卷一》）

(17) 喻我辈将看经教，须发信心，信心生而智慧生，信心灭而愚痴盛。听闻经教，如逢七宝之山，解起信心，认得一乘之理。（《敦煌变文集新书卷二》）

以上例句中“经教”从句意来看，都是意为“佛经”。例（15）明确指出“经教”有三科，即“佛经”有“三类”。例（16）的“经教”所指为前文的“小乘教说一切有部”，自然也是“佛经”。例（17）“看经教”、“听闻经教”，可知“经教”为“佛经”。

“经教”又可以指代“儒教经典”，如下：

(18) 今圣治钦明，道隆三五，九服之民，咸仰德化，而所在州土，学校未立。臣虽不敏，诚愿备之，使后生闻雅颂之音，童幼睹经教之本。（《魏书·卷四十六》）

(19) 夫食为人天，富而后教，经教彝体，前哲至言。（《旧唐书卷一〇五·列传第五五》）

(20) 今上礼记，是戴圣所编。历代传习，已向千载，著为经教，不可刊削。（《大唐新语卷之七》）

从文意来看，例（18）大意是向皇帝上书办学，“使后生闻雅颂之音，童幼睹经教之本”，“经教”显然指“儒家经典”。例（19）“经教”与“彝体”并列，也是指代“儒家经典”。例（20）“经教”明确指代儒家经典《礼记》。

“经教”又可以指代“道经”，如下：

(21) 勤行奉斋戒，诵经制六情。故得乘空飞，耀景上玉清。精心奉经教，吐纳练五神。功德冠诸人，转轮上成仙。（前蜀杜光庭《启堂颂》）

(22) 朕每以道元有属，思竭精诚，经教所在，岂忘崇奉。且宗其道者师其人，行其教者尊其礼。晋琅琊王公府舍人杨真人，护军长史许真人，丹阳上计掾许真人，皆道著妙门，感通元阙，降高真之迹，为上清之宗。（唐元宗李璟《加应道尊号大赦文》，引自《全唐文·卷三十九》）

(23) 所以称之为道士者，以其务营常道故也。至于法衣，非无差降。黄裳绛褐，式崇正一之仪；凤气飞云，用表洞元之服。载诸经教，此不缕陈。（唐史崇《妙门由起序》，引自《全唐文·卷九百二十三》）

例(21)中“杜光庭”是晚唐五代时期道士,精心所奉“经教”自然是“道教经典”。例(22)中前有“道元有属”,后面崇奉的“经教”也是指“道教经典”。例(23)中前有“道士”、“法衣”的介绍,后文指出“载诸经教,此不缕陈”,因此“经教”指“道经”无疑。

综上所述,“经教”在文献中常见,是对某一宗教经典典籍的称呼。因为这些宗教在当时影响都很大,并且通常情况下都具有一定的经典文本,并且是用来传教的重要工具和载体。以上例句中“经教”均指代儒道释三教经典典籍。

四、结 论

有了上述的认识,再回到唐太宗贞观十二年七月诏令“远将经教”中的“经教”来,就可知前人之所以误将“经教”认为是景教的别名,就在于“经教”从形式上看是“教”,有点类似于“佛教”、“道教”,因此就把“经教”与景教等同起来,认为是景教的别名。殊不知,这样的理解不但对于“经教”本身的理解不准确,而且对儒道释等宗教也不公平,一个可以称呼儒道释三教经典的中性名词就被景教专美了。同理,“波斯经教”也是教外之人对于景教经典的称谓,就如同称呼儒道释教称呼本教经典为“经教”一样。只是由于儒道释三教影响大、底气足,可以直接称呼本教的经典为“经教”而不会引起误解,景教在当时相对于儒道释教来说,还不是为世人所熟悉,所以才在“经教”之前冠以来源地“波斯”。但是,在朝廷的诏令中能够称之为“经教”,无形之中已经把景教和儒道释三教相提并论了。这已经是景教莫大的荣幸了。因此,“波斯经教”也只是对景教经典的称谓,绝不是景教的别名。

既然这样,“远将经教”中的“经教”就只能理解为“对某一宗教典籍的称呼”了,具体来说,就是指“景经”了。当然,如果模糊景教与基督教的区别,认为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分支,理解为基督教中的“圣经”也无不可。这样一来,唐太宗贞观十二年七月诏令“远将经教”中的“经教”与《景教碑》中的“经像”就构成异文,性质相同,意义也相同。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我们前文的猜测是正确的。

(责任编辑:和光)

本文为教育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会课题“唐代景教文献考注”(教古字[2010]073号)成果之一。此研究得到湖南科技大学湖南省社科研究基地“方言与民俗文化基地”资助。

- ① 为使行文简洁,下文一律简称《景教碑》。
- ② 《序听迷诗所经》可能是最早的汉语景教文典,大致译于贞观九年至十二年间,译者可能是阿罗本。全经仅存170行,2845字,“L”表示行数。
- ③ 张小艳:《敦煌书仪语言研究》,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07年,第192页。
- ④ 翁绍军:《汉语景教文典诠释》,北京: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1996年,第109页。
- ⑤ 江文汉:《中国古代基督教及开封犹太人》,北京:知识出版社,1982年,第24页。
- ⑥ 关英:《话说景教》,《丝绸之路》2000年第5期,第50页。
- ⑦ 叶蓉:《唐代景教之地域背景及名称质疑》,《浙江万里学院学报》2007年第4期,第36页。
- ⑧ 朱谦之:《中国景教》,北京:东方出版社,1993年,第16页。
- ⑨ 李伯毅:《唐代景教与大秦寺遗址》,《文博》1994年第4期,第36页。
- ⑩ 石明培:《略论景教在中国的活动与北京的景教遗迹》,《北京联合大学学报》2000年第1期,第90页。
- 11 从理论上讲,录文应该参照《景教碑》原碑。但限于条件,此处录文参照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品拓片原件进行校对,此拓片是目前国内最早最完整的本子。录文保留碑文原样,涉及的繁体字、异体字不作改写。
- 12 翁绍军:《汉语景教文典诠释》,第55页。
- 13 [美]斯塔夫里阿诺斯:《全球通史:1500年以前的世界》,上海: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,1988年,第437-438页。
- 14 [北魏]郦道元著,[清]杨守敬、熊会贞疏:《水经注疏(第3册)》,南京:凤凰出版社,1989年,第178页。
- 15 翁绍军:《汉语景教文典诠释》,第55页。
- 16 刘振宇:《唐代景教入华之际的时空环境及其影响》,《贵州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》2007年第1期,第51页。
- 17 杨志玖:《唐代的景教》,《历史教学》1997年第4期,第14页。
- 18 张雯霞:《唐代“景教”音乐初探》,《文教资料》2008年1月上旬刊,第47页。
- 19 《全唐文》为清代董诰等纂修,为避清康熙玄烨的讳,“玄奘”改为“元奘”。
- 20 朱谦之:《中国景教》,第86页。
- 21 葛承雍:《西安、洛阳唐两京出土景教石刻比较研究》,《文史哲》2009年第2期,第21页。